

推動出洋留學的信念所在。這部遊歷報告側面揭示了清朝當時所交鋒的列強皆善於以「淺試深嘗」方式，一步一步蠶食清朝的藩屬及其邊陲地區。外交上，需要靈活變通、用心周密而深遠的外交手腕，善於利用以夷制夷的制衡力量，這些表露在 1881 年他向總署提出守護越南的計策，可見其用心良苦。1876 年，他的好友郭嵩燾先讀了該書總說，即有所共鳴，「彼其人才之盛如此，用心之勤如此，中國一以伯言目論當之，安坐以肆其訾毀而已，此所以可懼也。」⁵⁰無奈知音難求，由於刊本缺圖、譯名艱深陌生，以及官紳對印支半島的形勢和動向認識粗疏，忽視其之於中國的地緣利害，使這部丁氏苦心之作幾近淹沒於書海，乏人問津。時移勢易，它在今天有何研究價值？想到今天國人有否如斯魄力親身探查，對印支半島作如此細密的學術性調查報告，筆者認為值得拿來這部過百年的譯著稍作淺說，冀有拋磚引玉的作用。

50 《郭嵩燾日記》第三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 年），光緒二二年二月十一日條，頁 17。

14. 選擇的記憶 ——以丁新民編《濟陽世澤：附丁氏族譜》為例¹

蔡志祥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一、前言

很多學者已經指出，族譜的記錄是有選擇性的。有些成員的傳記欄目，具備了詳盡的出生、死亡、墓葬、婚姻、子嗣的資料；有些則付諸闕如，甚至沒有任何的記錄。²族譜既然不是登記家族人口出生、結婚和死亡的完全記錄，它的存在，毋寧是一種「政治」的宣示，建構成員身份和

1 二十世紀創刊新版資料室編《濟陽世澤：附丁氏族譜》（香港：九龍大角咀萬安街八號，2001）。本書編者為丁新民，見第 43 頁。本書為丁新豹兄提供，謹致謝忱。

2 Faure, David, "The written and the unwritten: the political agenda of the written genealogy", 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292。參考 Harrell, Stevan, "On the holes in Chinese genealogies" Late Imperial China, no.2 (December 1987) : pp.53-79; Watson, Rubie, "The Named and the nameless: gender and person in Chinese Society" American Ethnologist, 13, no.4 (Nov. 1986) : pp.619-631.

關係的工具。³ 因此，族譜不僅是家族榮耀的記錄，也是家族事蹟的集體記憶。有記錄和無記錄、有名者和無名者，以至記錄的多寡、詳略、先後次序等，都顯現族譜記錄的高度政治性和選擇性。

譜牒無疑是成員共享的共同記憶。然而，繼嗣成員並不同譜系登錄的成員，而且，譜牒的傳記資料是選擇的而非平等的。因此，譜牒內容和繼嗣群體中的發言權有密切的關係。譜牒並非宗族繼嗣群體集體共享的記錄，而是部分的成員的選擇的記憶。雖然如此，本文嘗試指出作為「連接」工具 的譜牒，在結構上提供了譜系連接的空間。族譜編修是當代的、選擇的記憶。譜系的重修，也代表了記憶的重整。譜系的結構，容許了記憶追加和重整的可能性。本文嘗試以 2001 年丁新民根據 1986 年丁天駿編撰的《濟陽世澤》⁴ 而重修的《濟陽世澤：附丁氏族譜》為例，探討譜系記錄和記憶選擇的關係，並且嘗試指出記憶的選擇和譜牒內在結構的關係。

二、關於《濟陽世澤：附丁氏族譜》

我們不能夠確認 1980 年代以前，丁日昌所屬的湯坑丁氏是否有族譜。⁵ 這部 2001 年編的《濟陽世澤：附丁氏族譜》是以 1986 年丁天駿（1-6-2-2）⁶ 編撰的《濟陽世澤》為藍本編修而成的。全書為 A4 開本，共 69 頁。其目錄如下：

3 Faure, 上引文頁 295。

4 丁新民認為《濟陽世澤》為本書編修前 20 年編撰（見丁新民，頁 1—2）。孫淑彥則認為是 1986 年印本。見氏著《丁日昌先生年譜》（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頁 401。

5 孫淑彥編修的丁日昌年譜，收羅了與丁日昌有關的各種文獻資料，但並沒有有關丁氏的族譜。參考孫淑彥《丁日昌先生年譜》（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6（1-6-2-2）的第一個數字為第 11 世。第二個數字表示為前者之第六子，屬第十二世。第三個數字表示為前者之次子，屬第十三世。以下類推。

編者丁新民（1-1-1-1-4-2-1）所撰的序文（中英文）；

丁新豹（1-1-1-1-4-5-2）的題字；

丁家光（1-4-2-1-4-4）的獻畫；

錄自豐順縣氏族志關於湯坑丁姓之源流和分佈（中英文）；

1992 年旅泰 16 世裔孫丁家駿（1-1-1-1-4-5）撰的十一世賢拔公事略（中英文），並包括 6 張照片，其中三張為碑刻（1992 年在豐順縣修的墓園碑刻和家駿撰的賢拔丁公轉略）、在曼谷的丁氏大宗祠，以及丁氏後人在 1992 年重修的賢拔公暨一品夫人黃氏、袁氏墓的合照和在揭陽市的光祿大夫祠堂外的合照；

丁日昌傳（1-6）（中英文）並照片 17 張，照片包括 1992 年重修丁日昌墓園的碑記、家駿撰的「高叔祖日昌公傳」碑文，丁日昌遺像、墓園、紀念圖書館、紀念館以及丁日昌故鄉湯坑鎮、豐順縣、丁氏少時讀書的太平寺等地方的照片，也包括兩張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丁新豹和家人的合照；

丁志德（1-1-1-1）公傳（中英文）以及振威將軍志德公泥塑像之圖片；

丁雲波公史略（1-1-1-1-1）（中英文）及派下子孫簡介。後者包括 8 張人物照片和簡單的說明，照片包括雲波夫婦、三位兒子中的長子（1-1-1-1-1-1）、次子（1-1-1-1-1-2）以及次子的次子（1-1-1-1-1-2-2）（珠江石油有限公司的東主）的家人；

丁伯良公（即家駒，1-1-1-1-1-4）派下眾子孫簡介。包括 8 張人物照片以及一張「田豐行石油有限公司」外觀的照片，照片主要包括家駒五位兒子中的長子（1-1-1-1-1-4-1）和次子（1-1-1-1-1-4-2）的家人照片；

清波丁公傳略（1-1-1-1-4）（中英文），包括照片 6 張，其中四張為清波公分別和 4 位夫人的台拍的磁照以及 2 張 1991 年修陵墓的照片。墓碑上款題為「豐順湯坑振威第」；

丁家鏞公（1-1-1-1-4-1）派下眾子孫簡介，包括家鏞和弟家模（1-1-1-

1-4-4) 家庭的簡介⁷以及照片3張：家鏞和長子的合照、在新加坡的三子(1-1-1-4-4-3)和家模的家人照片；

丁祥麟(即家扁, 1-1-1-4-6)派下子孫簡介, 包括曾「參加一二八」上海保衛戰, 任十九路軍營長、官階至上校少將的家扁和家人的照片四張；

丁家駿公傳(1-1-1-4-5, 中英文), 包括丁家駿和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泰國領導人的合照、在家鄉拜祖等活動、子孫、企業以及喪禮、陵墓照片36張；

丁家毓公(1-1-1-4-2)派下眾子孫簡介。家毓為編者新民的父親, 曾當汕頭市高等法院書記官, 揭陽縣政府審判官。本部分包括家毓和家人的照片18張。照片注明家族代理的美國寶實油公司以及擁有的協豐行、協豐石油化工廠(1-1-1-4-5-5)、廣州市獅德潤滑油有限公司(1-1-1-4-5-1)、和MHL(1-1-1-4-5-1-2)、OCI電腦公司(1-1-1-4-5-1-3)擁有的照片；

丁新民撰寫的編後話；
族譜。

要言之, 本書包括兩部分: 第1至43頁以丁氏老大房的14世長房為中心的6個擴張家庭的紀念圖片集。第44至69頁為豐順湯坑鎮丁氏十一世賢拔公以下七房(老大房到老七房)的族譜。據編者丁新民, 圖片集又分兩部分:「前半部反映先祖之典範, 顯赫功績, 突出十二世祖丁日昌公為愛國傑出政治家形象, 享譽古今中外。及十六世祖丁家駿公, 在近現代政經結合下, 晉升於世界企業家之林。後半部反映被譽為石油大王丁家駿之帶領下, 同步伐獲得發展之石油業共十餘家, 及遍佈全球各地域, 在

7 簡介包括個人名字、妻子姓氏、兒子和女兒名字, 如:「十六世祖家鏞(曾在新加坡營商)妣陳氏生子四人新裕、光裕、慶裕、女孟光……(七人)」。

邁向廿一世紀族人等突出事例。」⁸族譜編修時常強調對宗族發展「有功」或「有德」者的記錄。圖片集記錄了兩個位於宗族顯赫地位的人物: 丁日昌和丁家駿。如圖一所示, 前者在清末的仕途顯然與十一到十三世、擴大家庭的科舉功名和皇朝封號有關; 而後者在石油企業的地位, 也許和老大房十六到十九世的成員廣泛從事石油企業有關。族譜的編修也突出對宗族建構有貢獻的成員。圖二顯示出資贊助本圖冊族譜的個人及單位包括(一)丁家駿基金會(1-1-1-4-5)、(二)寶實油有限公司、(三)協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1-1-1-4-5-5)、(四)田豐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1-1-1-4-2-1)、(五)珠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1-1-1-1-2-2)、(六)坤業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1-1-1-1-4-2-2)、(七)廣州獅德潤滑油有限公司(1-1-1-4-5-1)、(八)丁新豹博士(1-1-1-4-5-2)和(九)丁敏玲女士。這些個人和企業單位也在圖片中展現出來。

本書的第二部分為十一世賢拔公以下的「族譜」。這部分是從第44至69頁的譜系包括豐順湯坑丁氏第一到十九世的記錄。第一到十一世賢拔, 每個世代只記錄一位直系祖先和他們的妻子。從第八到十一世也包括生年和享年的記錄。第十二代是賢拔的七個兒子的記錄: 包括字諱、生卒年日、皇朝封號、妻子姓氏、兒子名字。二、六(日昌)子也有葬山的記錄。從第十三世以下, 分七房記錄。長房以外, 大部分的記錄只包括下列欄目: (一)某某公子、(二)第幾世祖、(三)名字、(四)妣某氏、(五)子某某。譜系的欄目也有書明住居的地方。如「(老七房)朝魁公子十六世祖文言(在泰國)」。⁹在長房的記錄之後(頁53)和族譜最後頁(頁69)有題為「後補」的空白頁。

雖然編者指出「經一年多以來遍及海內外, 各方探訪搜索, 核對資料務求詳實」,¹⁰從譜系的記載, 我們不難發現二房和三房登記的人口和世

8 丁新民〈編後話〉, 氏編修《濟陽世澤: 附丁氏族譜》, 頁43。

9 丁新民, 同上書。

10 同上, 頁1。

代特別少。五房和七房則有不少資料模糊或矛盾的地方。¹¹ 此種混亂可能與過繼關係有關。然而族譜並沒有說明。大抵而言，長房（丁家駿祖孫）和六房（丁日昌子嗣）的記錄最詳盡。族譜記錄的不平衡，一方面和族譜編修者所屬的房分有關。族譜在 1980 年初由長房的家駿倡議、六房的天駿編輯。¹² 而本書則由長房子孫編輯和出資。因此，長房和六房的資料也相對的多和確實。另一方面，族譜記錄的詳否，也許和宗族內的兄弟並非平等的有關。對宗族有功、有德的成員的家庭記錄詳、反之則略。有功、有德者

11 如五房十四世裕貴公生於同治丙寅年（1866），而其父日承則卒於咸豐戊午年（1858）。十五世朝魁生子文暢，而在十六世文暢則書紅魁子。又如第七房：

（同上，頁 66—67）

十三世祖惠均 生子廣軒、廣全、廣平、廣圍

惠均公子

十四世祖廣全公，號品南、諱國全公鴻 子恩魁、蔭魁、信魁、殿魁、聯魁、芳魁

十四世祖廣豐公號品南、諱國全

十四世祖廣豐公號西諱國鴻 子炎魁、樂魁、銀魁

玩東公子

十四（五）世祖恩魁

十五世祖信魁

十五世祖聯魁，號懋善，上校秘書長，生子雄文

十五世祖聯魁，號懋，陸軍上校參謀長，生子振文、姜文、鄉文、蒙文

十五世祖芳魁

品南公子

十五世祖炎魁生子興文（在澳洲企業家）

銘西公子

十五世祖炎魁，生子奉文、再文、鴻文、典文、慧文

十五世祖 生子庚文、省文、龍文

十五世祖銀魁生子華文、質文、港文、勝文

12 天駿在 1984 年（甲子）的濟陽世澤手稿前言：「此譜於一九八〇年春，由十六世祖家駿倡議，由天駿進行編輯。□一九八二年底初步編成。由於時移事愈，丁氏子孫遍佈海內外，故未能一一搜集，編入，實為遺憾。基於環境原因，□□先行編印。□□補充。並附譜後。敬希□提實貴意見，俾□完善，幸甚。」（參考孫淑彥《丁日昌年譜》，頁 29。）

的家庭記錄是當代的擴大家庭，而非萬世不替的宗族。擴大家庭的成員的記錄是選擇的，而非包容的。這和族譜的結構、連接和排他的功能有關。

三、在家與族之間

譜系是聯繫祖宗和子嗣的工具，聯繫並不需要依賴每一世代所有成員的記錄。就如祠堂內奉祀的祖先、或者墓祭的祖先一樣，譜系登錄對宗族有功、有德的成員是有選擇性的。參考圖三，也許我們可以問：為何長房志德（1-1-1-1）的父、祖、兄弟沒有特別的傳記記錄？為何家駒的伯叔有傳記記錄而其父親（1-1-1-1-2）沒有？為何其祖父志德有傳，其曾祖、高祖和叔祖則沒有？也許我們可以假設譜系記錄的，是通過共同祖先來聯繫不同房支的工具。因此，如圖三所示，十一世賢拔是聯繫長房和六房的共同祖先、志德是聯繫雲波、家駒、和清波三支的共同祖先。因此，志德的子孫要和六房聯繫的話，他們便需要找到一位共同的祖先。假如志德的子孫要和長房其他的子孫有所區別的話，便不需要強調其父（1-1-1）、祖（1-1）、兄弟（1-1-1-2、1-1-2、3、4）的關係。也就是說，譜系既有聯繫又排他的作用。聯繫和排他是當代和過去榮耀的選取，因此，強調的是家庭而非無選擇的包容的宗族。祖先的作用，是作為聯繫的接連點。

人生榮、辱無常，譜系的結構，提供了通譜、合族的將來性和可能性。如其他族譜一樣，不同房支只需要找到共同的祖先，便可以通譜。¹³ 本圖冊譜系記錄第一到十一世的直系祖先，每一代的祖先，提供了賢拔房以外的丁氏和賢拔房聯繫的連接點。移民或外出的人的後裔，族譜不一定有詳盡的記錄。賢拔的長子，日蒸，即家駿的高祖，也許是第一位出洋謀生的丁氏賢拔公派下子孫。本書的族譜部分，一方面列出了丁氏入粵始祖一郎公分支的六派（即使印下、中福社、紅羅坡、金麒麟、橫汕頭和小

13 如下柵盧氏和蘆鞭盧氏的例。參考盧湘父編《蘆鞭盧氏族譜》。

坑)，同時亦在各房外出的子孫欄目中，列出所居地方，如安南、貴州、泰國、香港、新加坡、加拿大等。提供了外出的人將來認祖歸宗的可能。認祖歸宗不需要嚴謹的譜系、生卒資料，名字和移居地已經可以提供足夠的彈性條件。

四、作為宗族記憶媒體的丁日昌¹⁴

丁日昌的父親賢拔有兩位妻子、七個兒子。丁日昌排行第六，他和弟弟是繼室黃氏所生。根據孫淑彥的研究，丁氏並非湯坑鎮的主導宗族。丁日昌的家庭可能不太富裕，宗族沒有提供書塾給他和兄弟唸書，也沒有提供盤川支助他到府城應試。¹⁵ 丁日昌的長兄日蒸公在 1849 年赴南洋工作。他的海外傭工也許提供了維持家中生計的資金。¹⁶ 丁日昌和他的兄弟子侄，大部分從事幕僚工作，或參加軍旅行伍。筆者並不知道丁日昌在家庭、故鄉，甚至潮州的位置。年譜記載，丁日昌在 1857 年赴瓊州任，家人十餘口暫寓揭陽（頁 87）；1867 年黃太夫人病至六月底稍愈，時先生之七弟遇齋在蘇州服侍（頁 161-162）；1870 年閏十月初四，太夫人黃氏去世，二十二，扶柩回粵舟過金陵（頁 227），1871 年正月二十三日，扶母靈柩到揭陽，暫租屋寄寓（頁 231）。是年，為擇地葬母事，往返揭陽、豐順，至十二月竣工等，顯示丁日昌和家庭、鄉里的疏離。李鴻章在 1866 年代奏丁日昌潮州洋務條陳摺，「日昌雖籍隸潮州，而住居鄉僻，且遊客多年，久未與潮人相習。去歲在上海任內，復因粵中遊勇逃匪，盤踞

洋涇濱，以搶劫為生涯，幾釀咸豐三年之變。稟請誅戮首惡百餘人，資遣回籍者八九千人。雖滬瀆氣一新，而故鄉不無怨毒之積。」（頁 143）因此，即使丁日昌辭官返回潮州，也不是回到湯坑，而是在揭陽建房居住。他的生母也是到 1991 年才在家駿安排下，與生父賢拔和原配袁氏合葬。

在孫淑彥編撰的丁日昌年譜中，我們知道丁日昌作了很多地方建設的貢獻。如 1855 年潮州豐順鵬湖書院，1873 年在潮州城為原惠潮嘉道曹履泰建曹公祠（頁 249），是年潮州水災，韓江上下游河堤決口，災民流離失所，積極參與防災治災事（頁 249），1874 年應豐順縣紳民之請，「留縣主李洪毓呈」（頁 256），倡建豐順鵬湖書院。（頁 256）上奏請為揭陽關帝廟賜匾（頁 297），1877 年捐款助建揭陽孔廟、募捐擴建潮州金山書院（頁 303），1880 年在豐順倡建有嬰堂（頁 336）等等。然而，年譜缺乏關於丁日昌的家鄉建設如修族譜、宗祠、地方廟宇、道路等等的記載。假如丁日昌對家鄉、宗族確實是如此疏離的話，他的地方建設，無疑是面對家鄉宗族以外的潮州社會，他所積極建築的社會資本，可以說是上層社會的、非鄉族的。家鄉對丁日昌的疏遠，也許和 1854 年募湯坑鄉勇抵抗會黨吳忠恕（頁 78）有關。他在 1866 年上郭筠仙中丞書中說：「以潮人辦潮事，棘手甚多」（頁 145）。

在清末的時候，丁日昌無疑是湯坑丁氏，甚至豐順縣、潮州府最赫赫有名的人物。然而對於鄉里來說，長房的丁志德（1-1-1-1）也同樣擁有軍功。他的子孫先後為鄉長（1-1-1-1-1 及 1-1-1-1-4），他在鄉中的振威第更為實在地體驗皇朝國家的存在。丁日昌墓在 1956 年被破壞。他的墓園得以修復，仰賴自泰國回鄉省親的家駿。

1978 年泰國豐順同鄉會首次回國。在泰國經營石油生意的泰國曼谷豐順同鄉會會長、賢拔公第十六世孫丁家駿（1-1-1-1-4-5）首先支持丁日昌的後人，十五世天駿編修以丁日昌為中心的題為《濟陽世澤》的族譜。1992 年，家駿出資、豐順縣政府協助下，分別建立賢拔和日昌的墓園（見 1992 年重修〔丁日昌〕墓園碑記，及高叔祖日昌公傳碑文）和丁日昌紀

14 本節主要根據孫淑彥上引書。

15 他和三兄在太平寺唸書；道光十年（1983），先生八歲，「隨三兄達夫就讀於豐順太平寺」（頁 33），十八歲，仍在豐順讀書（頁 44）。」年譜也記載丁日昌在道光二十二年二十歲時，中秀才。因家境貧寒，在赴潮州應試途中，因饑

餓昏得鄉里老婦供飯的故事（頁 46）。

16 同上書，頁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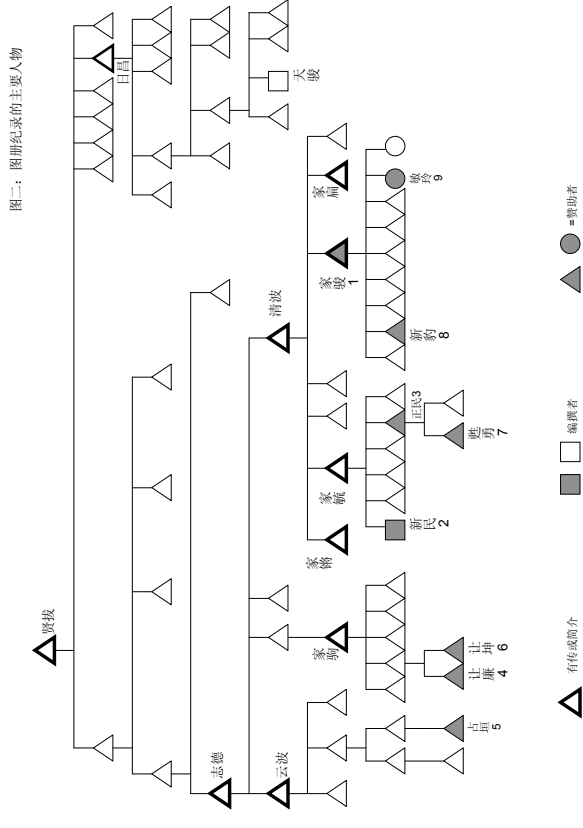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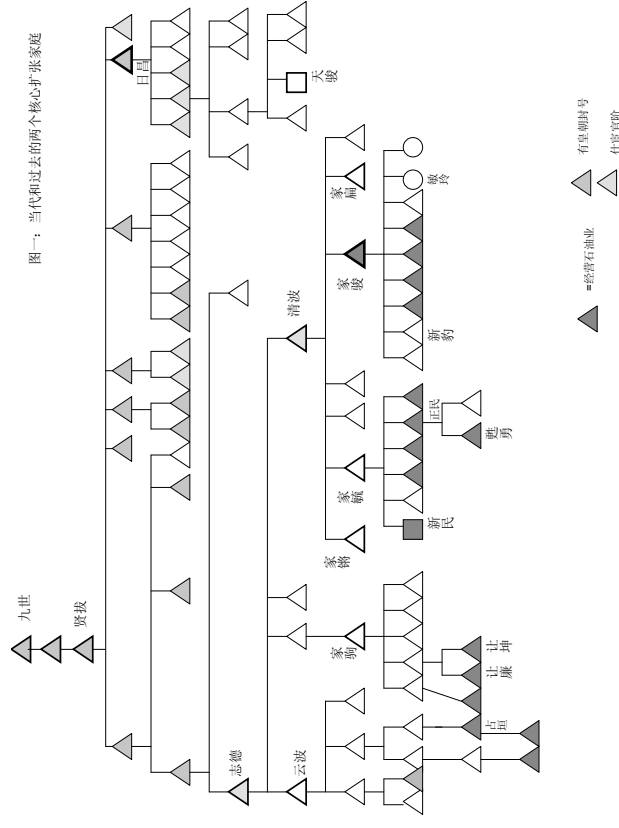
念圖書館。然而，立「重修〔丁日昌〕墓園碑記」的並非丁日昌派下子孫，也非湯坑丁氏子孫，而是「賢拔公裔孫」。也許，作為歷史記憶、歷史象徵的「丁日昌」的擁有權，既不屬於丁日昌派下子孫，也非湯坑丁氏。遠的不需要，近的連不上。要把對當代地方社會、湯坑丁氏有功、有德的人物和昔日對國家、潮州有功有德的人物連接的，是最接近他們的共同祖先：賢拔。

五、小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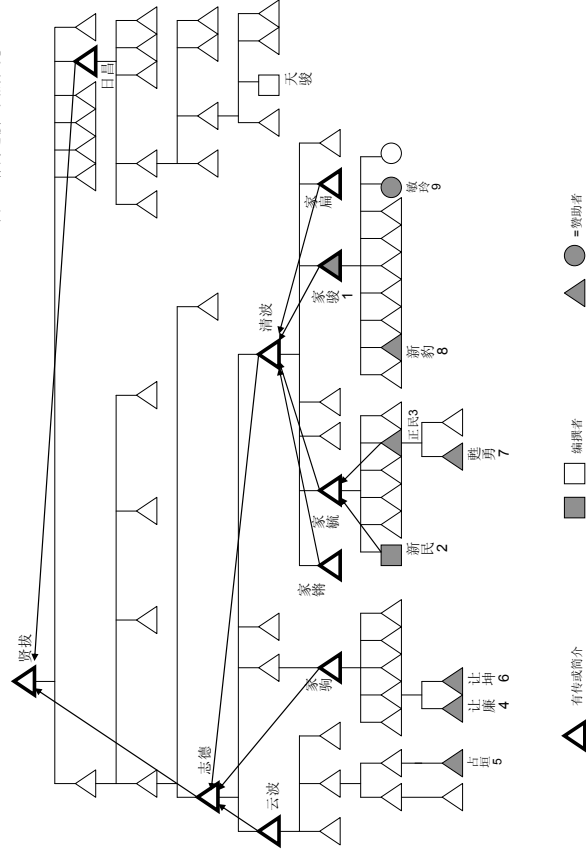
《濟陽世澤：附丁氏族譜》是一部以六個擴張家庭為中心的紀念圖冊和族譜。（圖四）它的編撰顯示出譜牒記錄當代和過去的有功、有德的宗族成員同樣是選擇的。它說明了譜牒記錄當代和過去的榮耀是具備政治性和選擇性，也提示了譜牒結構上在當代的排他性以及為未來的族人通譜、認宗準備的包容性。

表一 族譜登記的七房男性成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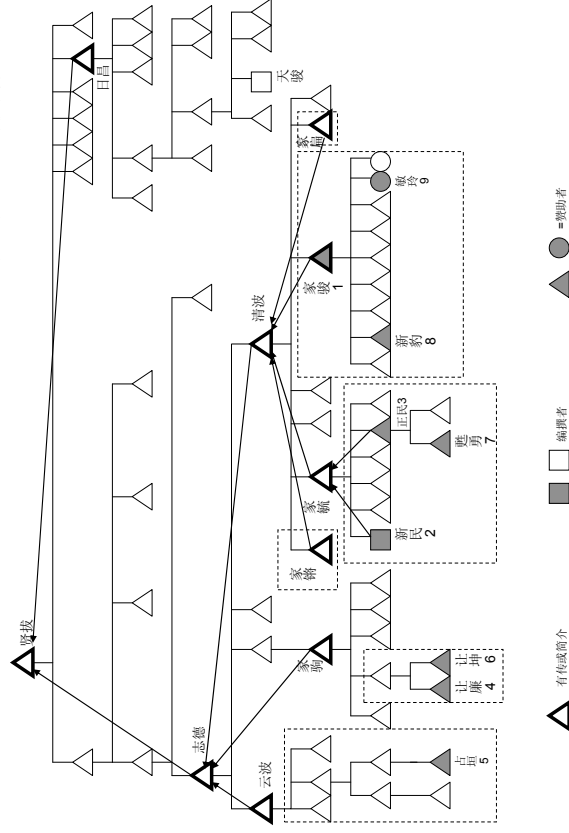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3-19 世人口
老大房	賢拔	慶福	4	6	17	23	41	43	15	139
老二房		慶生	1	1	1	1	3			7
老三房		春（顯榮）	2	6	6	3	2			19
老四房		慶揚	2	5	13	17	17	6		60
老五房		慶七	8	16	16	24	9	7		80
老六房		* 仁壽（日昌）	5	16	30	25	17			83
老七房		* 仁祿	7	19	33	45				104
合計	1	7	29	69	116	138	89	56	15	492



圖三：作為連接工具的祖先



圖四：圖冊紀錄的六個擴張家庭



15. 丁日昌研究述評

劉智鵬、劉蜀永

(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

丁日昌是洋務運動的健將，對推動晚清現代化進程貢獻良多。多年來史學界對丁日昌這課題一直沒有太大的興趣，丁日昌的研究無論在質和量上都無法與洋務運動其他主要成員的研究相比。然而，過去幾十年來丁日昌的研究也累積了一定的成果，可以作為日後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最早注意到丁日昌的史學家是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呂實強教授。他在 1972 年著有《丁日昌與自強運動》一書，陳述丁日昌的生平及其與洋務運動的關係。¹這是一部相當於丁日昌傳記的專著，研究重點在於探討丁日昌「於國家自強之抱負、作為與貢獻」。其內容包括丁日昌的出身及初入仕途的情況、蘇浙臺道時期、兩淮鹽運使時期、江蘇藩司與江蘇巡撫時期、船政大臣與福建巡撫時期，以及丁日昌退休以後的生活。

呂實強在書中另闢餘論一章，深入探討丁日昌對洋務運動所抱持的理想，並評論丁氏一生事業的成敗得失。呂實強指出，丁氏畢生言論中，有一項極為卓越的見解，即為對變局之認識與適應。他認為晚清一眾重要官員之中，李鴻章、丁日昌二人對時局的變化「感覺尤為敏銳，態度更為積極」，並且能夠提出有效應變的方案。就應變具體方案的提出和執行而言，丁日昌較李鴻章更為突出。書中又對丁日昌變革創新遭受挫折的原因

1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